

## 城市轉化的火花--當福音遇見文化時

中華福音神學院吳獻章老師

華人教會若要認真投入城市轉化，就必須認真思考福音與文化間的互動和宣教出路。

尼布爾認為福音與文化間的互動有五個模式：1. 基督反乎文化(Christ against the culture); 2. 基督屬乎文化(Christ of the culture); 3. 基督超乎文化(Christ above culture); 4. 基督與文化相反相成(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); 5 基督為文化的改造者(Christ transforming culture)。若從聖經來看，當福音預見文化時，只有不被時代潮流打敗、不被主流文化牽著鼻子走，才可能帶領主流文化。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就是歷史的實證。

在中古世紀，一方面，世人被「地乃四方」的意識型態所籠罩；另一方面，羅馬天主教曾經錯誤地解釋詩 104:5：「將地立在根基上，使地永不動搖」的經文，以致堅持托勒密(Ptolemy)提倡的地心說(以地球為宇宙中心的學說)。<sup>1</sup>這時多少受聖經「上帝將地球懸在虛空」的影響(伯廿六 7)，和大自然日出日落的啟示的哥倫布，開始主張地球是圓的學說，結果當然是飽受冷嘲熱諷。但他一直不放棄，到了五十幾歲被西班牙皇后引見，賜下兩艘船和八十八位死刑犯，揚帆西征、挑戰主流文化，終於在 1492 年發現美洲新大陸(馬丁路德時九歲)，並給後來的波蘭教士哥白尼(1473-1543 年)的天體運行論(1543 年)、路德宗基督徒科學家克卜勒(1571-1630 年)所提倡的「行星以橢圓繞著地球」的第一定律、在比薩斜塔旁藉著望遠鏡而觀察出「地球繞太陽走」的佛羅倫斯科學家伽利略(1564-1642 年)為真理而受審、和古典力學大師牛頓(1642-1727 年)的萬有引力定律，奠定了重要的註腳，<sup>2</sup>更影響到至今一直是全世界的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文化、科技的中心的美國。

保羅第一次旅行佈道預見猶太教靠行為、靠肉體稱義(行割禮、守律法、守節期)的文化。這個信仰上的偏差在第一次大公會議中雖被圓滿解決了(徒十五)，然而不靠上帝，卻想藉著肉體、行為稱義的思想，一直遊走在人類歷史的舞台上。但保羅一生事奉中，與華人所處文化最接近、最能成為華人信徒在華人事奉中榜樣的，大概是保羅如何在雅典如何面對希臘的雅典文化了。在雅典福音遇見下面幾個文化，這幾個文化和華人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：

- A. 雅典的以彼古羅學派(Epicurean; 主前 300 年)。他們教導「人生以享樂為目的，快樂為至善」，主張宇宙是由原子碰撞而來，人體只是由原子構成的，否認有永生，死後不能繼續存留，故不需處理罪或者死後

<sup>1</sup> Owen Gingrich, "The Galileo Affair", *Scientific American*, Vol. 247, No. 2 (August 1982), pp. 118-127; R. A. Torrey, et al, ed. *The Fundamentals*, vol.1 (Grand Rapids: Baker, 1998 reprint), pp. 341-343.

<sup>2</sup> Charles E. Hummel 著/閻人傑等譯，《自伽利略之後：聖經與科學之糾葛》(台北：校園，2002 年)，頁 52-193。

要在神台前受審的事。和後現代化的年輕享樂拜金主義看法相仿。

- B. 斯多亞學派 Stoicism。此學派由哲諾 (Zeno, B.C.335-263) 所創，他在雅典授徒(「斯多亞, stoa」意即「門廊」)，其世界觀為唯物論，強調世界受律所支配，這律主宰整個宇宙，決定宇宙中的每一個事情的運行。這律是宇宙的靈魂，人類在生活中必須效法這律，建立一個和大自然和諧的關係。要達到這個境界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讓理性完全控制自己，除去所有感情的牽制，所以他們主張追求美德，反璞歸真，回復自然(有些類似道家和宋朝王陽明的學說)；也主張禁慾，順從理性就是至善。這學說和占卜與星相學融成泛神論，有宿命論傾向。是喻意解經的創始學派。
- C. 偶像文化。保羅「看到滿城都是偶像」，一點都沒誇張，和普遍華人的民間信仰沒有兩樣。曾在尼祿皇帝宮中的作家、也是羅馬諷刺家 Petronius 譏諷說：「在雅典找一神明比找一個人還容易。」和墮落的哥林多文化一樣，雅典人因著拜偶像、靈性的淫亂(spiritual idolatry)，導致社會的亂倫(physical adultery)，廟妓充斥、社會亂倫、和他們哲學家所描繪的希臘神話中的神明一樣，整日思念嫉妒、邪情、自私等墮落情節。
- D. 希臘哲學(類似儒家)：這裡是希臘三大哲學家的發源地，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亞理士多德的學說橫掃西方哲學(和神學)。其地位高聳，拉斐爾(Raffaello, 1483-1520)為梵諦岡宮所畫「雅典學派」中，所有中古世紀的重要哲學家 and 神學家、希臘哲人，圍繞著辯論著的蘇格拉底，指著地的亞理士多德，和指著天的柏拉圖，可以端倪。這個「智慧人的智慧」的副產品，就是哥林多教會的結黨、紛爭(林前一 四章)。

本文則是要直接從保羅如何在雅典佈道，來看基督圖如何智慧地將福音傳入文化，讓福音成為城市轉化的火花：

#### 1. 被神愛感動而主動的人：

保羅剛到雅典時，從帖撒羅尼迦、庇哩亞被追殺的驚魂未定，同工也尚未各就各位，只因「看見滿城都是偶像，就心裏著急」，就開始他在雅典的佈道，對象包括在會堂裏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，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，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，不管這裡是希臘的文化中心，人間智慧的重要發源地。在進入一個非基督教的文化時，基督徒該有的第一反應，是像保羅一樣，帶著上帝愛的眼光來來憐恤這文化中的人。

誠然，外邦也可以找到一些真理--自然啟示(羅一 20)；約伯記中的約伯住在烏斯地，大概不是以色列人；箴言卅 卅一章甚至引自外邦人作品。但是，不爭的事實是世界上的人每個人，不論是撒瑪利亞婦人、稅吏撒該、拉比尼哥底母、亞基帕王，乃至「有名望的」(加二 6)，如希臘三哲也好、儒家子弟也好，都是罪人。不論是那個文化，哪個種族，都是罪人墮落的累積，都有敗壞的痕跡，通通需要福音，通通需要有人被主愛感動、「欠他們的債，情願盡力將福音傳給他們」(羅一 14~15)。

現今宣教學卻以儘量避免批判他人風俗，但早期的宣教士都是強烈責備當地的罪惡風俗，宣教士不能因為要避免得罪別人，而不責備當地風俗的罪惡色彩，沒有神的文化本身就充滿罪惡。每個文化、種族、個人，越有人被主愛俘虜而附上禱告、佈道的代價，就越蒙福。而越被神感動的人，越能從文化的盲點中來切入，而不被文化所改變。

在城市宣教過程中有兩個危機。第一個危機是被上帝感動後，卻不主動，失去了對社會的見證和影響力。早期教會在不滿政教合一後，走入修道院，和持著聖俗二元論、採閉關自守、遂失去在文化中見證的動力和地位的基要主義(fundamentalism)等，明顯地與保羅在雅典不僅「得時不得時」皆傳道，甚至站在巴特農神廟和人文市集 Agora(代表著人本主義)之間的樞紐亞略巴古講道，有明顯地誤差。反觀 Edwards、Wesley、Whitefield、Finney、Moody 等之所以能帶來英美的大覺醒、大復興，一重要的關鍵，就是主動走入需要的群眾中。人間的文化和宗教絕對不可能帶給人間生命的真正更新，除了教會學習摩西，推卻任何藉口(出四)，順服神的呼召，主動下山將福音帶入被世界的神擄走的文化，我們不要期望所處的文化可以轉化，更不要抱怨人心是福音的硬土！

第二個危機是沒有被上帝愛感動就投入城市宣教，結果是別人沒有被改變，自己反倒被改變、同化。經歷無數神蹟的以色列人，進入進入士師記後，被迦南人所同化，暗暗淡淡地過了墮落的四百年，就是借鏡。沒有神的文化有一共同特徵：像享樂主義的創始者以彼古羅人，將希臘哲學宗師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亞理士多德間的師生戀，引以為豪，對於歸乎生死復活大事卻當作新聞說說聽聽(徒十七:21)。

您我若沒有被神改變的人，焉能奢望改變如此根深的文化？沒有主愛感動，就無從在困難的局勢中經歷剛強、更無法在短暫的世俗中持守永恆的真理！

路德說的對：「基督徒在世上，如同船在海中，只要海水不在船上就是安全的。只要世界不在心裡，信徒就安全。」從基督教思想史看，沒有真以神為本的文化必然會走向相對主義路線，也必然有被吸收、轉化、變質的空間。

斯多亞學派的思想很容易被深受亞理士多德影響的天主教吸收。放棄聖經權威的德國路德宗，在第二次大戰中，毫不提防地被希特勒引誘，成為殺害猶太人的工具。受追求「善」、但主張靈魂才不朽、肉體要毀壞、沒有復活觀念的柏拉圖所影響的康德、自然神學、Jefferson，當然會將神學扁化為倫理學。受五四愛國運動影響的趙紫宸、吳耀宗、丁光訓等，以基督教當作改革的工具，信仰被扁平為政治、道德的層次，耶穌不過是改

革的工具和手段，而非信仰生命上的「主」，結果當然容易成為大環境之下的孤獨客，迷失了信仰的純正。

## 2. 從創造論引導進入基督論：

被上帝感動，站在亞略巴古的保羅，其佈道的策略，明顯地與和在帖撒羅尼迦直接傳基督論不同(徒 17:1-3)，他也沒有像在庇哩亞一樣直接引用舊約(徒 17:11)。保羅卻用他們泛神論的術語為對話起點，「眾位雅典人哪，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。我遊行的時候，觀看你們所敬拜的，遇見一座壇，上面寫著『未識之神』。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，我現在告訴你們」(徒十七 22-24)，接著，他畫龍點睛地闡述：

「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事，好像缺少甚麼；自己倒將生命、氣息、萬物，賜給萬人。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並且豫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們尋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」(徒十七 24-27)

保羅技巧地強調這位獨一真神的超然性外(transcendence)，也呈現了祂也是臨在(immanent)的神：「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；我們生活、動作、存留，都在乎他。」更強調真神的絕對性：「沒有神，人沒有動作、存活、生命。」保羅並用斯多亞學派宗師 Zeno 的學生 Cilician 人亞拉突(Aratus, B.C.315-240)對宙斯的讚美名言，「就如你們作詩的，有人說：『我們也是他所生的。』」(十七 28)，改成聖經的創造論，接著從創造論引導到機督的死裡復活(徒十七 29-31)。保羅如此傳講，強烈地暗示著：

- a. 人間最聰明的腦筋，仍分別不出上帝與萬物之間的差異。保羅沒有藉著修辭學的辯論、邏輯思考的言語來餵養雅典人的驕傲。主張上帝融入萬物中、拜了萬物即是拜了上帝泛神論，在保羅所傳的道中，窘態全露！
- b. 以彼古羅的主張，謂世界是機緣而產生(類似佛教和進化論)，在保羅眼前顯得極為膚淺。斯多亞循環論式的困境(宇宙萬物一直由宇宙的靈魂「logos」所主導，從火 氣 水 土的循環)，也被一針見血地點出。
- c. 保羅所說「我們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、心思所雕刻的金、銀、石」(巴特農神廟是雅典人為紀念打敗亞哈隨魯王所蓋，斯一)，有知識的雅典人如蘇格拉底，都會同意(蘇格拉底的死因就在被控告毀謗巴特農神廟而死)，雅典的所有的偶像顯得極其無能和脆弱，人間的偶像不過是人類自己用物質所造出來的假神。

在泛神、多神、無神論、人本主義等多元的華人文化中，保羅提供了一個極重要的佈道模式：先從上帝中心(God-centered)下手，尋求相關性(relevance)，再切入獨特性(uniqueness)，傳揚基督中心

(Christ-centered)信息。福音派的宣教學大師 Paul Hiebert 曾指出，在佛教根源地印度佈道的一秘訣，是從印度人喜歡尋求「智慧」的特質著手(相關性)。出生在印度宣教士的他發現，舊約的箴言是佈道利器。如此藉著詩歌智慧書來呈現創造論和基督論(獨特性)，和保羅的佈道策略完全吻合，實在值得華人信徒深思！

從儒家的本質看，華人儒家的心性哲學的錯誤，在以為人可以裝天在心，故有人心乃天心之說。儒家思想欲將上帝內化，謂人展現道德之善的時候，乃是在展現天理的主張，在保羅以上帝為中心的真理架構中，弊端和缺陷油然浮現(若將人心 = 萬物，儒家觀點就類似泛神論)。

從聖經來看，華人社會在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人本架構下，因著沒有聖經對於造物主的啟示，又沒有機會好好明白上帝在祂兒子基督的救贖計畫，當然沒有機會明白三位一體中聖靈的作為，因此，幾千年來，華人人本主義的儒家文化，必然會被算命、風水所迷信、被佛教、道教所取代。此外，杜維明也指出，「辛亥革命」摧毀了以儒家倫理為根本的專制政權，五四運動打擊儒家。儒家的沒落已是不爭的事實。

儒家內聖、外王的理想很高，但沒有神本成為人本架構的支撐，頂多是靠著孟子「先立乎大者」的人論、道德形上學(因此往康德的道德論取經)為根基，在現實環境中必然會難以逃脫和其他學說掛勾的命運，因此杜維明認為儒家可以從基督教神學中的智慧結晶得到啟示。但是儒家的問題仍是像天一樣的高。

第一，沒有神本的人本恐怕找不到真智慧，因為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」。

第二，如杜維明所認為，儒家更大的問題，是缺少文化更新的動力。原因很簡單：儒家沒有基督教超越的神(也是杜維明所承認)。沒有神本，沒有創造論、沒有救恩論、沒有聖靈，哪會有文化更新的動力？李約瑟說中國雖有印刷術、火藥、羅盤針的發現，但是卻發展不出一個科學方程式(如  $E=M*C^2$ )，原因就是儒家(和佛教、道教)都沒有清楚的創造論。難怪 Berkeley 歷史系教授列文森曾以「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」為文說，儒家擋不住西化。

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提出，西方科技、經濟發達的原因，就是受強調創造論的加爾文的社會觀影響。反觀儒家(和所有的宗教)因為沒有聖經的創造論，因此難發展出西方的科技、經濟、科學文明。儒家(和所有華人文化)最需要的，是保羅在雅典傳道信息的核心：創造萬有的神，和基督的救贖！

保羅不僅強調創造論，他對基督論的闡述絕對不含糊。那些假借著推銷以上帝為中心的(God-centered)，試圖討好拜外邦假神者，以利對外對

話，尊重原住民的神明，乃至推銷「五教共和」普世救恩論，已然進入泛神論的邊緣，骨子裡卻是排擠基督為救恩核心為中心的宣教策略，其弊端在於分裂聖經創造論與基督救恩論的完整神學，卻將彼得「除了基督以外，別無拯救」視為自大(徒四 12)，實在是自貶身段。

保羅在泛神、多神、無神論橫行的雅典文化中，仍傳基督的十字架上死裡復活(十七 18, 31-32)。在雅典佈道會往哥林多，他闡述他一貫的佈道原則：「弟兄們，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，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祕。因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。」(林前二 1-2)。那些討好外邦宗教的神學觀點者，該聽聽外邦人如何勸基督徒。牟宗三指出，基督徒為何不從耶穌身上來談基督教？言下之意：為何閃閃爍爍？自貶身段？難道基督不是主？這樣以「福音為恥」的人，自有耶穌來審判：「凡在人面前認我的，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，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。」(太十 32-33)。

### 3. 帶著白色大寶座眼光來傳十字架

保羅闡述了創造的主、救贖的主後，他引導他的聽眾進入末世論，「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，神並不監察，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。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，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，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，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。」和保羅的其他書信一致的是，保羅戴著末世的眼光來傳道。

戴著末世眼光來看福音如何進入文化，最重要的問題必然會浮現：基督徒最要緊的角色，是改變文化呢？還是傳道引人歸向神？當然，若有人投入文化/制度的改造，讓文化不抵擋福音，甚至讓文化成為福音的預工，乃至有人投入政治、法律、教育、監獄等等的更新，讓基督徒專業人員投入各行各業，讓信徒成為各行各業的見證，當然是美事。聖經內不就有政治家如尼希米、但以理嗎？加爾文神學家 Abraham Kuyper 還成為荷蘭首相，而且他當首相時，沒有偏袒基督教，完全秉公行事，其影響力比藉著該權位來包庇、濫用權威更好、更深遠。

從保羅如何在雅典佈道看出，基督徒事奉的焦點不在改變文化。基督徒對於問題的看法更深遠。馬克斯(和不少人間文學家)認為問題出在社會的制度，因此要藉著無產階級(或人道主義)的方式來改變制度，但是保羅(和奧古斯丁、加爾文)看到問題的真相：不在制度、架構、文化而已，而在文化最深層裡人心裡的罪，那裡，只有福音可以改變。因此，保羅戴著歷史眼光來傳道，即使他在處理阿尼西母的案子時，他當然知道他碰到羅馬囚犯所受不公平待遇的階級制度，但是在腓利門書中保羅單單傳人與人和好、人與神和好的福音，卻將奴隸制度留給一千多年後的 Wilberforce

和林肯去處理！

戴著末世眼光看，教會需要各行各業的 Wilberforce 和林肯。但是，若沒有 Wesley 和 Akers 分別傳道給他們，制度和文化怎能更新？聖經裡所記載，人間最根本的問題，不是制度或文化，而是人！制度的改變不能解決一切的問題，除非在糾正罪惡制度時，人本身也被糾正，否則新的制度上來可能會更官僚、更腐敗！從保羅如傳道給亞略巴古的官、耶利米傳道給猶大諸王看，基督徒的角色是在君王、制度、文化之上，將上帝的福音傳給文化/制度下面的人，讓上帝藉著我們有十字架的釘痕，引導人歸向神，才是最主要的角色！

正如哥倫布有著與主流文化不同的眼光，因此影響領導主流文化，神兒女一定要帶著末世的眼光來事奉，方能成為將福音帶入文化的傳遞者。保羅在雅典講道信息的最後，他豪不諱言地指出上帝「已經定了日子，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，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，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。」在談城市轉化的宣教策略中，我們該和保羅一同站在那原為審判(包括宗教、法律、乃至死刑犯)之處亞略巴古，想到本可以信主的人(如貼近保羅、信了主的人，包括亞略巴古的官丟尼修，並婦人大馬哩等;徒十七 34)，內中還可能有否認有肉體復活的柏拉圖般的華人儒家子弟，像拒絕末世論以彼古羅般的年輕拜金主義者，和追尋像斯多亞循環(和網綁)的佛道華人骨肉之親，會不會在末世白色大寶座審判的時候，責怪您我：為何不像保羅，讓主愛感動而主動，從創造論導入基督論，將福音的火花點入文化的盲點？